

# “邑中善人”秦润卿与家乡慈善事业



郑嘉毅 孙善根

慈善事业,宁波人俗称做善事,在宁波历史相当悠久。近代以来,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成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,涌现出一大批造福桑梓的仁人。其中,钱业巨子秦润卿堪称典范。秦润卿在家乡广泛从事慈善事业,除较为人知的重教兴学外,从济贫扶困、敬老恤幼,到倡办实业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,可谓应有尽有。



上世纪20年代末的秦润卿  
(图片均由作者提供)

历史上,慈溪地方医缺药少,疾病一直是人们生命的最大威胁。特别是1909年前后,慈溪瘟疫流行,死者无数。鉴于此,慈溪绅商发起成立保黎医院,“以济贫病”。成立之初,该院设施极为简陋,不久,即得到秦润卿的大力支持。因早年由于疾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接连失去亲人,秦润卿对家乡百姓缺医少药的痛苦有着深切认识,保黎医

院创办后,他即以医院兴衰为己任,积极参与该院事务,特别是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。创办伊始,秦润卿即捐大洋八千,兴建院舍。此后一直担任董事一职,尽心尽责,成为少数几个与医院相始终的人。

在秦润卿等旅外慈溪商人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苦心经营,保黎医院成立不久即“声誉大起……为吾浙私立医院冠冕”,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。

创办于清同治年间的慈城云华堂,是清末民初宁波一地较有影响的慈善机构,以办理育婴、施药、舍材、埋葬等善举为主。1919年,秦润卿成为云华堂董事后,与李寿山、盛筱珊等旅外商人一起不仅捐资支持,而且努力推动云华堂变革,使之从一个传统善堂发展为孤儿教育为主的近代慈善机构。特别是1941年4月,慈溪沦陷后,云华堂处境日趋艰难,经济上入不敷出,当时隐居在上海的秦润卿仍多方予以援助。

由于秦润卿宅心慈善,且在旅外慈溪乃至宁波商人中极孚人望,故一旦家乡举办善事或遭遇天灾人祸,家乡人民乃至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润卿。而他也总是竭其所能,全力以赴。1935年4月初,因旱灾严重,民食为艰,慈溪县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支持下开办平糶,无奈县政府经费支绌,垫款无着,于是县长成应举致函居住在上海的秦润卿,请求予以帮助。秦润卿迅即发动旅沪同乡筹款予以支持。1938年5月,秦润卿获悉家乡存粮将罄,米价飞涨,即与钱业同乡购米数千石,急运家乡,并委托县政府、抗日自卫会等组织举办平糶。上世纪30年代,沪甬两地宁波人发起重建灵桥时,秦润卿又是沪地筹备委员并捐洋一千。

作为一名具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商人,秦润卿不仅重视济贫扶困之类的传统善举,更注重如何从根

本上解决被救助群体的生计问题。突出表现就是,在家乡大力倡导蚕丝生产,增加农民收入。秦润卿对农民和农村富有感情,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了解。由于经营钱庄的关系,秦润卿经常与蚕丝业打交道,因而知道蚕丝是太湖流域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。而当时家乡慈溪蚕桑“不甚发达”,农民经济来源单一,收入相当有限。为此,秦润卿以很大的热情向家乡农民倡导与推广蚕桑生产。

1918年起,秦润卿从无锡等地购买桑秧和一批优良的蚕种,运回慈城老家,无偿分发给乡亲,并从苏州蚕业学校聘请养蚕专家,传授养蚕知识。为了尽快将蚕桑在慈溪各乡推广开来,秦润卿与慈溪县农会会长阮昉商榷,由县农会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。同时,为了让农民尽快了解栽桑养蚕的好处,他雇人在慈城东西两座城门口栽植桑树,并雇园丁加以管理,起名为“模范桑园”,请人观摩。秦润卿还让自己的弟子修德人到各乡挨户宣传蚕桑好处。由于秦润卿与县农会的积极倡导,乡人看到了栽桑养蚕的好处,“纷纷争栽桑秧,领养蚕种”。据1926年《时事公报》报道:“慈城旅沪绅商每年购办蚕种桑秧,分送各邑农民养蚕栽种迄今已有数载,成效卓著。”

作为上海钱业领袖的秦润卿,还多次出面帮助家乡平息金融风潮。1918年9月初,宁波发生钱业风潮,引起市面恐慌。宁波旅沪同乡会即在其建议下,推举虞洽卿、秦润卿等7人专程赴甬斡旋,次日



甬上钱业即告复业。为使家乡人民早日享用现代文明,改善生产生活条件,1926年初,秦润卿还在慈城发起成立慈明电灯公司,使得百年前的慈城即“大放光明”。

尤为可贵的是,当时形成了以秦润卿为首的慈溪籍慈善家群体,他们相互配合,相互支持,非常默契,汇成一地慈善事业经久不衰的合力。如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国货界的任士刚(曾经的中国首富荣智健夫人任绵绵的祖父)是家喻户晓的“汗衫大王”,在家乡慈城也有多项善举。对于这个比他小20年的同乡晚辈,秦润卿赞赏不已,将其视为自己在家乡事业的继承者。不意,由于辛劳过度,1946年3月,年仅51岁的任士刚病逝,秦润卿为之扼腕。当年7月13日,《慈溪报》报道称:“当秦润卿讲至‘余老矣,毕生未竟事业,百年之后,原期士刚继承,詎料彼竟先余而死’时,声泪俱下。”

可以说,对于家乡的慈善公益事业,秦润卿无役不从,以致“无论识与不识,无不知为吾邑善人”。秦润卿的善举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。时人称其“笃于孝亲,厚于睦邻,凡乡里善举,靡不尽力以赴”。上世纪30年代发行的慈溪县小学乡土教材,将秦润卿造福家乡的事迹编入其中,赞其为“邑中善人”,以为垂范。

(作者单位: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)

# 要做“多面手”莫当“多面人”



随思录

罗浩声

笔者有一位朋友,当年从部队退役时,因有篆刻一技之长,选择了自主择业。到地方后,篆刻功力日益精进,前些年他加入了中国篆刻界的“顶级俱乐部”——西泠印社。让人钦佩的是,他并非“一招鲜,吃遍天”,身上加持的还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头衔,平时撰写一些介绍当地书法、篆刻历史的文章,也颇有见地,妥妥的一个“多面手”。

还有一位写了多年时评的同道文友,最近也干起了“出圈”的话:先是隔三差五地在报刊发表一些生活杂感之类的文章,抛出的观点不仅抓人眼球,而且文采斐然、入木三分;令人惊讶的是,前不久,他突然又在报上发了一整版的散文。稿子写得有血有肉、有声有色,切口虽小,开掘很深,读后回味无穷。

环顾四周,发现类似“多面手”式的人物很多,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时尚。特别是不少退下来了的“老同志”,有的过去是“一本正经”做官的,在位时政绩、口碑、风评都不错;有的是办企业的,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;有的长期行伍,可谓戎马一生。在进入人生“下半场”后,他们展示了过去所未展示的才能,或摄影,或书法,或写作,或讲学,或兼而有之,“玩”出了人生的新境界,活出了人生的新风采。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。与这些让人眼羡的“多面手”不同,社会上还有一种“多面人”现象。兼具这类特点的人,大多工于心计,善于经营,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混得左右逢源。他们擅长察言观色、曲意奉迎,“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”;他们遇事只论利害,不论是非、原则,

与己有利的,千方百计往前靠,与己无益的,则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;他们待人通常有两副面孔,用得着的,“面若桃花”,用不着的,“冷若冰霜”,就像川剧变脸一般,瞬息可变。

在官场上,这类人还有一个“雅号”——“两面人”。用老百姓的话说,他们“对上与对下不一样,台上与台下不一样,人前与人后不一样,表态与心态不一样”。其行为特征,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。有的台上唱的是“正气歌”,台下行的是“龌龊事”,说的是一套,做的是另一套;有的要求下属、别人是“马列主义”,对待自己是“自由主义”。他们镜头感极强,最擅长表演,公众场合表现出的“人格魅力”,还真容易迷惑人。

有道是,“疾风知劲草,日久见人心”。“两面人”也好,“多面人”也罢,他们确实能够糊弄一些人,但不可能糊弄所有人,他们有可能一时糊弄人,但不可能一辈子糊弄人。毕竟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,如果不是“本色出演”,即便“演技”再高,终究也有露馅的时候。远的不论,且看这些年各地反腐新闻,落马的“两面人”“多面人”还少吗?如苏荣、秦光荣、傅政华、孙力军等,都曾是长袖善舞、位高权重之辈,可结局又如何呢?所以,中国传统文文化还是倡导“老老实实做人,本本分分做事”。心术不正,靠玩心机、当“多面人”,是行不远的。

要做“多面手”,莫当“多面人”。人的一生,如白驹过隙,何其短暂。不论从事什么职业、行业,都应多珍惜名节,少追求名利。与其费尽心机当“多面人”,不如靠自己的本事当一个“多面手”。有了正气和才气打底,即便不能一世显达,人生大厦总不至于倾覆,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缠身。心无杂念,坦坦荡荡,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,多好!

# 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新机遇

新知

常修泽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,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与市场息息相关的民营企业应该捕捉什么新商机?内需扩大、要素搞活、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,应该成为民营经济人士着力抓住的三大机遇。

一是抓住内需扩大的新机遇。马克思说,在社会生产中,产品是人们“需要的对象和奴仆”,生产是为了“满足个人需要”。“人”是主人,“产品”是“奴仆”,这是鲜明的人本导向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“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”,符合人本导向。消费方面,下一步要着力解决人们“能消费,敢消费,放心消费”三个问题。“能消费”,必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。浙江应聚焦新的消费业态和大宗消费,稳定大宗消费,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,如房地产、新能源汽车、养老健康消费等,尤其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,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;在内需投资方面,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将带动全社会投资,也一定会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,特别是数字经济类的投资。浙江提出以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“一号发展工程”,是“识时务者”。这方面,建议思路再开阔些。如浙江土地资源比较稀缺,可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——包括农业生产智能化、农业服务智能化、农产品加工智能化,这样可在数字技术基础上,再造新的“三产融合”。

二是抓住要素搞活的新机遇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,“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,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”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到今天,商品市场这一块,已经放开97%,下一步的重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,也就是“要素型改革”。七大要素,可分为三组:人本要素——劳动、知识、技术和管理;物本要素——土地、资本;混合型要素——数据。“这次机构改革,无论是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,还是调整国家知识产权局,都是瞄准知识、技术等人本要素”。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,是瞄准资本等要素。组建国家数据局,更是要发挥“数据”这一战略资源的作用。对于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来说,搞活数据要素是一个重大机遇。如何在产权界定基础上,统筹数据资源并进行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,浙江的发展空间很大。

三是抓住制度型开放的新机遇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,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“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”。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,这是新趋势,更是新机遇。制度型开放是商品、资金、技术等“五个流开放”的战略升级和扩大。目前,RCEP协议已经生效,我国也于前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。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去做,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一定会有力地促进改革、促进发展。例如,放宽市场准入,减少市场壁垒,平等竞争等,将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,对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来说,无疑是一个重大机遇。广大民营企业,应尽快明了并掌握相关规则,主动作为、积极准备,热情拥抱制度型开放带来的新机遇。

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 
来源:《浙江日报》



借鸡下蛋

王永琦 绘

何良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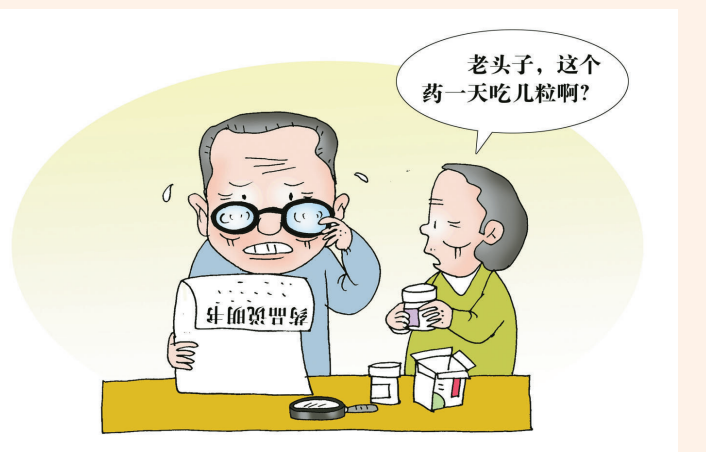
3月22日是第三十一届“世界水日”,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六届“中国水周”。在这特殊的日子,我不禁想到了古代水利工程。中国古代有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:都江堰、灵渠和郑国渠,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,被写入教科书。近年来,海曙区鄞江镇它山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,在宁波便有了“四大水利工程”之说。

四川都江堰,不仅让曾经的荒蛮之地变成了天府之国,且历时两千多年,至今仍发挥着作用。广西灵渠,是秦始皇为平岭南而开凿的——因山路崎岖,粮草运输困难,秦纵有虎狼之师,三年不能南下。灵渠通航后,长江和珠江水系得以沟通,一年内,秦军就一举平了岭南。如今,灵渠的航运功能已慢慢淡化,成了一个著名景区。郑国渠,虽然如今仅存遗址了,但它的故事仍有启示意义。

《史记·河渠志》记载:“韩闻秦之好兴事,欲罢之。毋令东伐,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,令凿泾水,自中山邸瓠口为渠,并北山,东注洛三百余里,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觉,秦欲杀郑国。郑国曰:‘始臣为间,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’秦以为然,卒使就渠。渠就,注填阡之水,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,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为沃野,无凶年,秦以富强,卒并诸侯,因命曰郑国渠。”

七国争雄时期,弱小的韩国偏安一方,为防止秦国进攻,派出水工郑国,游说秦国建设引泾河水的大

漫画角



为难

沈海涛 绘

# 郑国渠:不只是一项水利工程



郑国渠位置示意图

规模水利工程,以此消耗秦国实力。秦中计,接受了郑国提议。水渠施工过程中,阴谋被秦发觉,秦要杀郑国。郑国坦言:自己确是韩国间谍,建水渠是为了“疲秦”,而延缓攻韩。但长远来看,建水渠对秦有利啊!

秦王嬴政(后来的秦始皇)接受了郑国的说辞,同意继续施工,放手让郑国负责。水渠建成后,受益农田达4万顷,关中沃野千里,再无歉收年。秦国因此迅速富强,为其后扫平六国打下经济基础。秦为纪念郑国的功绩,就把水渠命名为郑国渠。

前些年,笔者随专家考察郑国渠遗址时,发思古之幽情,认为它留给后人四点精神启迪。

发展就要增强实力。秦在建郑国渠时,征用了大量劳役,国力消耗巨大,不得不缓攻韩国。其间,韩国如果把握机遇,励精图治,富国强兵,历史或将为之改变。可韩国当政者安享“疲秦”之计带来的片刻安宁,亡国命运就成了必然。一个人、一家企业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要生存、要发展,就必须脚踏实地、奋发图强,增强实力。

竞争取胜靠实力,实力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。也许有人会说,当年苏秦、张仪靠耍嘴皮子“合纵连横”,一时风光无限……其实,推敲一下,苏秦、张仪等策士们游说的,正是如何“运用实力”。游说哪个国家可攻、

哪个国家能守、哪个国家可一战而下,本质上是对实力分析的结果。赢政深谙这一点,在先攻韩还是先建渠上,两利相权取其重。郑国渠的建设,为秦统一六国奠定经济基础,正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明证。

欲成大事需有大胸怀。郑国渠在建设过程中,曾出现变故。“疲秦”阴谋被识破,郑国承认了自己身份。但是,郑国对嬴政晓之以理,表示“臣为韩延数岁之命,而为秦建万世之功”(《汉书·沟洫志》)。“秦以为然”。嬴政能认真听取敌国间谍分析,从国家发展大局认识建渠的意义,继续使用敌国间谍,用人不疑,这是何等的气度;该渠真为秦带来巨大效益,为纪念郑国,便命名它为郑国渠,又是何等的气度。

开放包容,才能拓宽视野、成就大事。嬴政执政初期的战国,社会思想活跃,客卿现象盛行,策士游说于各国之间。秦政权中的吕不韦、李斯等高官,均是客卿出身。一些宗室的大臣因此上书说:“诸位来事秦者,大抵皆为其主游间于秦耳,请一切逐客。”当时,恰逢嬴政欲除“仲父”吕不韦专政,借此免了吕不韦职务。但很快,嬴政便欣然接受了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中的观点,回乡途中的李斯等人被召回重新启用,郑国也得以继续主持引泾灌溉工程。择善而从,知人善用,是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原因。